

Mobilizing School Attendance: The Enrollment Dilemma of Primary Schools in the North China Anti-Japanese Base Areas and the Strategies Adopted in Response

Fang Zheng

Faculty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China

2755806934@qq.com

No ORCID

动员上学：华北抗日根据地小学的招生困境与应对策略

郑芳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Received 18 December 2025 | Accepted 3 March 2026

Abstract: The difficulty of getting children to attend school and of recruiting pupils were persistent dilemmas faced by primary schools in the North China Anti-Japanese base areas, rooted in the sharp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time and economic costs of schooling and the impoverished lives of the populace. What the people of the base areas most needed was to secure adequate food and clothing, yet the non-productive “men of knowledge” cultivated by primary schools could not meet this need; moreover, living amid war and poverty, the people also harbored doubts about the schools' capacity to train useful talent. To resolve this dilemma, the base areas, on the one hand, granted publicly funded preferential treatment to the children of poor families and of households supporting the resistance, adjusted educational policy, combined education with labor production and family life, and drew the populace into school decision-making, thereby easing economic hardship and dispelling popular anxieties about the “uselessness of study” and misconceptions about the schools. On the other hand, the base-area schools worked to overcome the threat of war, improve teaching conditions, and adopt differentiated mobilization strategies, going household by household to mobilize children to attend school. In safeguarding school-age children's access to education, they also built up a reserve of talent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war effort and for the country's subsequent development.

Keywords: primary education; enrollment; North China Anti-Japanese base areas; differentiated mobilization

摘要：儿童上学难、学校招生难是华北抗日根据地小学长期面临的困境，这一困境根源于上学的时间、经济成本与群众贫苦生活之间存在尖锐矛盾。根据地群众最需要的是解决温饱，而小学培养的不事生产的“知识人”无法满足此要求；加之身处战乱贫穷之中，群众对学校的人才培养能力也心存怀疑。为解决这一困境，根据地一方面对贫抗属儿童给予公费优待，调整教育方针，将教育与劳动生产、家庭生活相结合，吸纳群众参与学校决策，缓解经济困难，打破群众“读书无用”的忧虑和对学校的误解；另一方面，根据地学校努力克服战争威胁、改善办学条件、采取差异化的动员策略，逐户动员儿童上学，保障适龄儿童就学机会的同时，

也为中共抗战及后续国家发展储备了人才。

关键词：小学教育；招生；华北抗日根据地；差异化动员

抗战、生产、发展教育是中共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工作，三者密切结合，贯穿于一切工作之中。^①抗日根据地的农民受教育程度低，文盲众多，不利于抗战宣传动员工作的开展，而教育可以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培养其抗战意识和家国情怀，为抗战乃至未来之建国储备人才。小学教育是农村各种教育的中心与基础，其发展能推动各种教育的前进。^②除基础教育职能外，中共抗日根据地小学还是组织训练“共产主义儿童”、与敌伪争夺青少年之重要机构。战时小学广泛组织少年儿童从事农业生产、抗战宣传、军事保卫等工作，为中共抗战乃至政权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③，不仅是农村宣传与文化斗争的堡垒，还是农村社会团结的核心与生活指导机关。^④小学教育于中共抗战、根据地建设乃至国家前途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学界目前对战时小学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小学教师^⑤、教科书^⑥和学生的日常生活^⑦等领域，较少探讨小学招生问题。^⑧虽然王龙飞与大卫·凯尔·埃里森（David Kyle Ellison）的研究有部分内容涉及小学招生问题，但并非是其研究的重点，未作深入讨论。

学生是受教育的主体，学生问题是学校工作的基本问题。没有学生，教育则无从谈起，动员不到学生，或者学生经常流动，学校工作就难以正常开展。^⑨抗战时期很多老百姓既无力也不愿送子女读书，招生成了抗日根据地小学的一大难题，所以招生动员是抗日根据地小学一项长期性的日常工作。探究此问题是梳理和认识中共抗日根据地教育发展史的必要基础，有利于阐明抗战时期发展教育的

^① 《地委扩大会议的总结》（1943年5月26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004-0001-0012-0001。

^② 力生（1940年10月22日）：《在职宣教干部应协助发展小学教育》，载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1986）：《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抗日战争时期（下册）》，第458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③ Ellison, David Kyle (2021). "Martyrs, Models, and Miscreants: The 'Communist Child' in Wartime North China, 1937-1948,"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④ 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1983）：《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8辑（1941.12-1942.8）。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第117页。

^⑤ 比如：刘昶（2008）：《革命的普罗米修斯：民国时期的乡村教师》。《中国乡村研究》第6辑，第42-71页；王龙飞（2014）：《战争与革命时空下的小学教员与学生——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第5期，第101-112页；姜朝晖、朱汉国（2015）：《民国时期乡村教师的生存状况》。《史学月刊》第4期，第67-76页；李常宝（2018）：《抗战期间中共太行根据地小学教员生存样态探微——以襄垣县为中心》。《史学月刊》第9期，第68-75页；曾凡（2023）：《民国时期乡村教师的公共角色研究》。西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⑥ 石玉（2013）：《中国革命根据地教科书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⑦ 如：Ellison, David Kyle (2021). "Martyrs, Models, and Miscreants: The 'Communist Child' in Wartime North China, 1937-1948,"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王星慧(2022)：《华北根据地少年儿童生活变迁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⑧ 主要原因在于材料少且零散，某些时间段和地域未有相关史料保存下来，搜集整理难度较大。

^⑨ 《兴县第一完全小学校1943年4月至8月份一学期的工作总结》（1943年），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41-0001-0018-0002。

艰难曲折，理解小学教员、学生、老百姓以及基层教育干部所面对的艰难处境，认识这些小人物在时代困境下的生存智慧和创造力。本文拟以华北抗日根据地为中心，对抗日根据地小学的招生问题展开讨论。^①

一、招生困境及原因

儿童上学难和学校招生难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学龄儿童入学率和经常到校率是反映其上学情况的最直观数据。以下是华北抗日根据地各地学龄儿童入学率的统计情况。

表 1 华北抗日根据地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

时间	根据地	入学率		
		男	女	合计
1940年	晋察冀	70.50%	32.10%	55.50%
	晋冀鲁豫			60%
1941年	晋绥	22.20%	19%	20.70%
	晋冀鲁豫			60.20%
1942年	晋冀鲁豫	74%	57.70%	66.80%
1943年	晋绥	56.70%	28.40%	46.90%
	晋冀鲁豫			60.60%
1944年	晋察冀			42.30%
	晋冀鲁豫			59.70%

注：由于材料所限，无法得到全面抗战时期华北抗日根据地学龄儿童入学率的完整数据，比如缺乏 1940 年前的数据，这主要是因为日本全面侵华后，华北原有的小学教育遭到严重破坏，此时期处于中共抗日根据地及其小学教育的初创期，其体制机制还不够完善，无暇顾及各种数据的统计和上报。此表只是各个时期部分地区抽样调查统计情况，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但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本文将其与其他材料配合使用。

资料来源：根据档案中的统计数据整理所得。^②

^① 本文之选择华北抗日根据地，除资料原因外，还因为华北抗日根据地小学教育体系较为完善，战时教育发展较为成功（比如庄户学等尝试）。

^② 《北耽车学校关于送学龄儿童调查表给平北县办事处的报告+学龄儿童调查表》（1940 年 12 月 28 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068-0006-0025-0003；《平北第四区德和村学龄儿童调查表》（1940 年 12 月 23 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068-0006-0025-0012；《珩堂村学龄儿童调查表》（1940 年 12 月 19 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068-0006-0025-0013；《临县 1941 年 7 月至 9 月份教育工作总结》（1941 年 11 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47-0001-0024-0001；《左权县 1942 年教育工作总结》（1942 年 12 月 31 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66-0001-0030-0006；《左权县第七区联合学区关于教育工作概况的报告》（1942 年 12 月 22 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66-0001-0030-0007；《武东县第五联校教育工作报告》（1942 年 12 月 15 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81-0001-0071-0005；《武东县第六联校 1942 年度教育工作报告》（1942 年 12 月 20 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81-0001-0071-0008；《祁县政府教育科 1942 年 3、4 月份工作报告》（1942 年 5 月 3 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58-0001-0032-0001；《偏关县 1943 年 4 月至 1944 年 3 月教育工作报告》（1944 年），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36-0001-0012-0001；《晋冀鲁豫边区政府 1943 年学校教育工作总结表》（1943 年 6 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98-0004-0003-0012；《辽西县 1944 年半年来教育工作概况》（1944 年 9 月 5 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66-0001-0034-0004；《晋察冀边区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公署：1944 年小学教育总结》（1945 年 1 月 10 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号：0130-001-0023-0001。

由表 1 可见，整体上入学率不高，最高不足 70%，最低的仅有 20%左右，各地都存在较为严重的失学现象。表中未能呈现的山东抗日根据地儿童失学现象同样严峻。1941 年山东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设立的小学教育发展目标为：先进地区要有 40%以上的学龄儿童入学，已建立民主政权，工作比较有基础的地区要有 30%以上的学龄儿童入学，落后地区平均每五个村庄要有一处小学。^①可见，此时山东抗日根据地学龄儿童入学率也是很低的，就连最先进之地区也不足 40%，大部分学龄儿童都面临上学难的问题。

从时间上看，入学率的变化没有明确的时间规律。比如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入学率一直在 60%左右徘徊，晋察冀根据地在 1940 年为 55.5%，但到 1944 年反而降低到 42.3%，晋绥根据地 1941 年的入学率为 20.7%，1943 年上升到了 46.9%。各地入学率没有明确的变化规律，主要是因为动员上学不是一劳永逸、一蹴而就的工作，成功动员到校的学生中途可能停学、辍学。战争、灾荒等客观形势的不同也会影响小学招生的难度。所以入学率是曲折变化的，这也说明了招生动员工作的曲折性、反复性与持续性。但这并非说明招生动员工作是无效的，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还能有这样的入学率，正是根据地各方努力的结果。

入学率存在区域差异。不仅不同根据地入学率不一样，即使同一根据地内部的不同区县、甚至不同村和学校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比如同为晋冀鲁豫区的左权县和武东县，1942 年前者的入学率为 63.4%，后者为 70.9%。^②同为晋察冀根据地平北县的北耽车、德和、珩堂三村 1940 年的入学率也不同，分别为 53.8%、51.7%和 62.7%。^③晋察冀边区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1944 年统计了 9 个村的儿童入学率分别为 50%、47%、60%、50%、50%、35%、15%、27%、47%^④，可见不同村的差距可能还很大。这主要是因为不同地区的战争情况、经济发展水平、地形、村庄布局、交通条件以及文化氛围和思想观念等都有所差异。一般来说，远离敌区、经济较为发达、村庄集中、交通便利、原有教育基础比较好的地区入学率更高。比如 1941 年 5 月 9 日，山西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关于平北教育工作给平北办事处、教育科的指示中就表示该县大部分村庄都很集中，动员儿童较容易，

^① 《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关于一九四一年文教宣传工作计划大纲》（1941 年），载山东省档案馆、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2021）：《山东革命历史档案汇编》（第五辑）。北京：新华出版社，第 2542 页。

^② 《左权县 1942 年教育工作总结》（1942 年 12 月 31 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66-0001-0030-0006；《武东县第五联校教育工作报告》（1942 年 12 月 15 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81-0001-0071-0005；《武东县第六联校 1942 年度教育工作报告》（1942 年 12 月 20 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81-0001-0071-0008。

^③ 《北耽车学校关于送学龄儿童调查表给平北县办事处的报告+学龄儿童调查表》（1940 年 12 月 28 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068-0006-0025-0003；《平北第四区德和村学龄儿童调查表》（1940 年 12 月 23 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068-0006-0025-0012；《珩堂村学龄儿童调查表》（1940 年 12 月 19 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068-0006-0025-0013。

^④ 《晋察冀边区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44 年小学教育总结》（1945 年 1 月 10 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号：0130-001-0023-0001。

未受战争破坏，社会较安定，物质困难较少，易于儿童上学。^①若村民居住分散，上学山路遥远，崎岖陡峻，将会造成年龄小的孩子上学不便。^②

入学率的性别差异较大，由表 1 可知，男生的入学率普遍高于女生。比如 1940 年，晋察冀的男生入学率高达 70% 以上，而女生却只有 30% 左右。1943 年，晋绥根据地的男生入学率达到了 56.7%，而女生则只有 28.4%。除此表之外，其他统计数据也反映出类似的现象。比如，武东县第四高级小学校 1944 年统计，全校共有二个年级，二年级 14 人，其中女生仅有 1 人；一年级 27 人，女生只有 2 人。^③兴县第一完全小学校 1943 年 4 月至 8 月份一学期的工作总结中说，女生只占全部学生的 29%，越是高年级，女生越少。^④1943 年 5 月，左权县第三两级小学校统计数据显示，高小总共 47 人中，女生仅有 1 人。^⑤这主要是因为较大的女生要在家参加劳动生产、做家务、带弟弟妹妹^⑥，重男轻女的观念及地方陋习（比如童养媳等）阻碍了女孩的上学之路。若家庭经济资源有限，一般都会选择供男孩上学，甚至有的女孩在学龄期就早早嫁人了。^⑦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 1942 年左权县贫寒儿童和抗属儿童的入学率，女生就高于男生。贫寒儿童女生的入学率为 58.3%，男生只有 31.4%，抗属儿童女生的入学率为 84.1，男生则为 71.9%。^⑧这主要是因为贫抗儿童可以享受公费优待，为了改善女生失学严重的现象，在同等条件下，优待会优先考虑女生。

单看入学率还难以准确掌握学龄儿童的上学情况，因为有的学生在上级检查时到校，但检查结束后就不再上学。^⑨更多的则是农闲时到校，农忙时则在家干活，偶尔上学，其中途停学、辍学的现象则难以通过入学率展现出来。所以，还要看学生流动情况，即经常到校率。1941 年，晋绥根据地的临县学生经常到校数

① 《山西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关于平北教育工作意见给平北办事处、教育科的指示》（1941 年 5 月 9 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068-0006-0010-0025。

② 《左权县 1942 年教育工作总结》（1942 年 12 月 31 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66-0001-0030-0006；《左权县第七区联合学区关于教育工作概况的报告》（1942 年 12 月 22 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66-0001-0030-0007；《辽西县连壁村教育工作总结》（1943 年 3 月 6 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66-0001-0034-0002。

③ 《武东县第四高级小学校 1944 年 2—6 月工作总结报告》（1944 年 6 月 30 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81-0001-0074-0004。

④ 《兴县第一完全小学校 1943 年 4 月至 8 月份一学期的工作总结》（1943 年），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41-0001-0018-0002。

⑤ 《左权县第三两级小学校概况报告》（1943 年 5 月 1 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66-0001-0032-0002。

⑥ 《东坡上一般经济情形与青年儿童工作考察总结》（1940 年），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218-0001-0012-0003。

⑦ 《武东县第五联校教育工作报告》（1942 年 12 月 15 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81-0001-0071-0005。农村地区存在一定的童婚现象，女孩子早早嫁人既可以省下口粮，又可以换彩礼，以减轻家庭经济负担，童养媳制度就是如此。参见王星慧（2022）：《华北根据地少年儿童生活变迁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⑧ 《左权县第四区联合学校 1942 年教育工作总结报告册》（1942 年 12 月 30 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66-0001-0030-0009。

⑨ 《偏关县 1943 年 4 月至 1944 年 3 月教育工作报告》（1944 年），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36-0001-0012-0001。

仅占入学儿童的 52.1%，占学龄儿童总数的 10.8%。^①在晋冀鲁豫地区，1942—1944 年间左权县只有 36% 的学生经常到校。若将较远山庄也算在内，则经常上学率仅占 28%，黄沟村经常上学者仅占学生的 50%，全部学龄儿童的 25%，也就是 75% 的儿童未能正常上学。^②1943 年，辽西县连壁村在总结 5 年来教育工作时表示，学生数量在农忙农闲时变动很大，冬春达 80 余人，夏季实际不过十几人，变动达 60%，春耕秋忙时都要放假。^③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文登县学生到第三学期开始多不上学，有的学校学生不过半数，由于大量的学生中途辍学，导致课程难以继续推进。^④

由此可见，华北抗日根据地小学不仅入学率低，而且学生流动现象严重，大量的学龄儿童难以正常上学。何以致此？这主要是由小学教育和群众实际生活之间的矛盾所致。根据地群众原本就生活贫苦，经常在温饱的边缘挣扎。若遇战争、灾荒，他们的生活可能会陷入绝境，啃树叶、吃树皮，十二三岁的孩子还没裤子穿都是常有之事。^⑤在这种极端环境下，他们最迫切的是解决温饱问题，无力亦无心送子弟读书。

1942 年 9 月 10 日，晋绥根据地的晋西北第二行政区教育工作报告显示，教育面临的第一大问题就是农民穷，念不起书。^⑥兴县第一完全小学校在动员儿童的过程中发现，很多生活困难的家长说没吃的没穿的，不让孩子上学。^⑦1944 年，晋冀鲁豫的武东县第四高级小学教员反映，地方狭小，百姓穷苦，多半缺食，不能上学，招生十分困难。^⑧武乡县第三两级小学校也反映该校地处贫苦区域，贫困学生占大部分，他们求学心切，但因家境贫寒，中途辍学者众多，至于想上学而家中不能供给的人数则更多。^⑨

这些穷困的家庭不仅供不起子弟上学，同时还需要其在家劳动，以维持生计。十几岁的孩子能顶半个劳动力，若让其上学，将会耽误生产。1940 年，晋冀鲁豫的冀太联办教育处长杜润生在冀南太行太岳教育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大部

^① 《临县 1941 年 7 月至 9 月份教育工作总结》（1941 年 11 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47-0001-0024-0001。

^② 《左权县政府关于左权县教育改革问题的报告》（1944 年 7 月 14 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66-0001-0036-0001。

^③ 《辽西县连壁村教育工作总结》（1943 年 3 月 6 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66-0001-0034-0002。

^④ 《文登县的教育数字问题》（时间不详），山东省档案馆藏，档号：G031-01-1824-003。

^⑤ 《东坡上一般经济情形与青年儿童工作考察总结》（1940 年），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218-0001-0012-0003。

^⑥ 《晋西北第二行政区教育工作报告》（1942 年 9 月 10 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099-0002-0001-0001。

^⑦ 《兴县第一完全小学校 1943 年 4 月至 8 月份一学期的工作总结》（1943 年），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41-0001-0018-0002。

^⑧ 《武东县第四高级小学校 1944 年 2—6 月工作总结报告》（1944 年 6 月 30 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81-0001-0074-0004。

^⑨ 《武乡县第三两级小学校春季工作报告》（1944 年 7 月 3 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81-0001-0077-0002。

工农家境贫寒，需要儿童过早地参加生产，因为儿童过早参加劳动生产，学校越到高年级学生越少。^①

太南县程家山、城南两学区表示，巩固儿童经常入学在农闲时尚能勉强维持，但农忙尤其是夏旱时节，教员们则束手无策，事实上就连较有基础的黎城二区已在7月份先后垮了3座私学，该区的南堡公立小学经常到校的学童也不过15-20人。其他较好的主村学校，如潞堡和潞城石棣，也多半是较小的孩子在上学，至于一般的初小，四年级以后几乎没有学生了。各年级经常入学的比例为：半年级生占24%，一年级占31.1%，二年级占24%，三年级则锐减至10.1%，四年级则更少。越到农忙时，儿童入学数越会减少，同样，若遇灾荒贫苦儿童减少得更加严重，“他们不是在家帮大人刨地、套牛、下种就是饿得下不来地，拉不下屎，或者受雇于别人放牛羊”。大的女孩子则留在家里纺花织布，外出采集野菜，拾草籽，有的甚至作为童养媳被送到婆婆家去了。^②

贫穷对根据地儿童上学的影响，还体现在上学机会的阶级差异上。根据晋冀鲁豫区的左权县第二两级小学1942年底的学生成分统计，高级生48人中，3个人是地主，9个是经营地主，13个是富农，16个是中农，贫农只有7人。^③全面抗战开始后，该县二三两级小学，高级共毕业191人，其中地主成分的儿童27人，富农47人，中农92人，贫农24人。^④表面看似中农占多数，但实际则不然，若按人口比例看，地主学龄儿童为141人，富农为1028人，中农为4069人，贫农为4761人，则地主儿童高小毕业率为19.1%，富农为4.6%，中农为2.3%，贫农为0.5%。由此可见，贫农子弟享受高小教育的机会远小于地主富农子弟。这主要是受农村劳动生产及生活的影响。相比于地主富农，中农的孩子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参加劳动生产，贫农的孩子更甚，大部分参加生产，很少有上学机会。高小孩子年龄较大，劳动能力更强，这就使得在不同阶级之间上学机会差距较初小更为明显。^⑤

阶级差异还体现在家长对学生毕业后的出路期待不同。往往穷苦家庭更需要孩子毕业后立马就业，从而养活自己、反哺家庭，若学生毕业后没有很好的出路，他们便不愿意送子女上学。但富裕阶级则不然，他们无需孩子毕业后立刻反哺家庭，而是可以忍耐更长的沉淀期，从而实现更多的可能，因此毕业生的出路问题

^① 《联办教育处长杜润生在冀南太行太岳教育扩大会议上的报告：全区教育工作的总结及今后教育建设的新方向》（1940年8月25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97-0001-0076-0002。

^② 《太行第四专署关于太南各县对教育工作领导的概况》（1943年8月28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068-0003-0001-0021。

^③ 《左权县第二两级小学校关于教育工作的报告》（1943年4月30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66-0001-0032-0001。

^④ 还有1人成分不详。

^⑤ 《左权县政府关于左权县教育改革问题的报告》（1944年7月14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66-0001-0036-0001。

并不会或者更少影响他们送子女上学的意愿，他们的子弟也更容易动员。通常可能会认为抗日根据地民众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缺少人才，读过书的知识人都很容易获得较好的出路，但事实则不然，小学毕业生的出路问题在当时仍然是一个较为严峻的问题，且直接影响家长送子女上学的积极性。

1944年7月3日，武乡县第三两级小学在其春季工作报告中指出，学生出路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学生们认为毕业就是失业，虽有少数能升学的也是富有之家，其余大多数普通群众基本上没有办法。在普及教育与照顾普通群众方面来说，这是工作上的一大缺陷。“如我校去年毕业15人，没有一个升学的，自己找工作，现在竟还待业在家的有3人。”^①1944年，左权县政府在关于教育改革问题的报告中表示，全县191个高小毕业生中，有29个是二流子，占13%，有44人回家务农，但他们没有生产知识，吃不了生产的苦，时常想出去工作，但缺乏社会常识，对政策法规不了解。如果高小毕业生还能有一部分参加工作，那么初小毕业的情况则更不容乐观。因之群众反映“书也没念成，地也荒啦”^②。有的贫苦家长直骂：“这年头，上学吧，顶什么事？毕了业吧，还不是吃45斤米。”^③

也有家境稍好、有能力却不愿送子弟上学的。这主要是因为在教育正规化的背景下，教育内容与农民实际生活脱节，农民将上学视为一种负担，大儿童换小儿童，儿童多的家庭也只去一两个，上学如同出兵出差一样，招生成为学校最大的困难。^④一般群众送子女上学是希望他们能够读书识字^⑤，将其培养为对自己和家庭有益的人。如果孩子在校学不到东西，更有甚者，读了书、有了文化的孩子还嫌弃自己的文盲父母，不愿再干粗活累活，家长将会怀疑学校是否在为自已培养孩子，认为读书不仅无用，反而有害，从而不愿再送子弟上学。

山东行政工作会议教育总结报告指出了这种现象，“群众们希望于儿童者是将来成为农村勤恳生产劳动者，而学校所训练者都是些不事生产，厌弃劳动的人，群众们所希望于其子女者是养成吃苦耐劳的工农意识，而学校所培植者却是些地主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意识的人”。该报告还认为课程亦太杂太多不适用，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群众学习时间有限，需将大部分时间用在生产上。他们可能仅早晚及农闲有空，而学校却要求他们全日制学习。这些不符合群众实际利益的要求，会让其觉得学校不是在为他们办教育，而是他们在为学校上学。由政府主

^① 《武乡县第三两级小学校春季工作报告》（1944年7月3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81-0001-0077-0002。

^② 《左权县政府关于左权县教育改革问题的报告》（1944年7月14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66-0001-0036-0001。

^③ 《关于黑峪口文化教育的调查材料及黑峪口知识份子调查表》（1942年9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41-0001-0097-0001。

^④ 《行政工作会议教育组总结报告（草案）》（1944年11月），山东省档案馆藏，档号：G004-01-0026-006。

^⑤ 《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抗日战争时期（下册）》，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347页。

导的公办学校群众难以参与，比如，他们无法选择自己喜欢的教员，无法让自己的意见被学校采纳，自己的力量也难以主动贡献。^①

也有家长对教员质量、管理方式、学校环境设备等情况不满意，他们认为学校没有能力培养好自己的孩子。比如，1942年9月10日，晋西北第二行政区教育工作报告中说，教员质量太低，小学文化程度占最多，其中高小占54%，初小占17%，文化程度如此低的教员难以高效完成教育工作，甚至有些百姓说：“先生自己都不懂，不能教人。”神池有个别教员因自己能力不够，把三年级的学生降低到一年级，而且这种误人子弟的现象在各地都有。^②保德县也表示，校舍及设备太简陋，教员质量差，对教育工作无诚意、少兴趣，一般人包括教员在内都不重视教育。^③

还有的群众认为小学招生是征兵的幌子，送子弟上学就等于将其上交给公家，从而对学校动员自家孩子上学的行为感到恐惧，怕把儿子抓到军队里去了，故不愿其上学。^④祁县县立高级小学反映，一般群众以为该校招生就是扩兵提拔干部的别名，尤有悲观绝望者认为，战时不需要教育，甚至有部分干部也是如此认识。这是因为县级武装自卫队到高小扩兵并对民众宣传他们扩兵和学校招生一样，引起了民众对学校的恐惧与校内外学生的不安。还有家长认为儿童一进了学校就成了“公家人”，从而不愿意送子弟上学^⑤。他们说：“不叫孩子上学了，上学时候长了，本领大了，就要到外边去工作，不再是家里的人了。”^⑥这主要是因为有的地区一个乡甚至一个区才有一所学校，多数学生都要离家住校，长期脱离家庭，家长对学校的活动又不了解，就误以为孩子成为公家人、不管家里了。^⑦

战争除加重群众经济困难外，其本身对教育的破坏性也是阻碍学生上学的重要因素。1942年晋绥根据地的黑峪口小学曾表示，敌人的扫荡和在黑峪口及其周围驻很多机关，他们经常买通消息，并在学校周围活动，使得人心惶惶。每次总是先生、学生各回各家，否则，若有差错，师生将难以担责。学生有本村的和外村的，每次集合起来就很困难，学生不到影响先生的情绪，先生迟到也会影响

^① 《行政工作会议教育组总结报告（草案）》（1944年11月），山东省档案馆藏，档号：G004-01-0026-0006。

^② 《晋西北第二行政区教育工作报告》（1942年9月10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099-0002-0001-0001。

^③ 《保德县1941年11、12月教育工作报告》（1942年1月15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37-0001-0008-0002。

^④ 《寺头自然村人口、群众工作、文化教育等的研究材料》（1941年12月28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005-0001-0021-0005。

^⑤ 《根据地教育的改革与建设》（1945年），山东省档案馆藏，档号：G资料-03-0628。

^⑥ 《平山教育工作前半年总结（一月—七月）》（1943年9月15日），载王谦主编（1990）：《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初等教育分册》（上），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第117页。

^⑦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1986）：《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抗日战争时期（下册）》。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第350页。

学生的到齐，这样每次要拖拉一个月左右。^①晋冀鲁豫的榆社县第四联合学区也因战争关系迁居山沟，离校很远，有的儿童房屋也在战争中被毁，导致流离失所，无法上学。^②根据武东县政府 1942 年 4 月初至 5 月前半月教育视导工作报告，大部分学校视导后，经过整理走上正轨，但不到 10 天就遭逢日寇扫荡，经过 4 天，就将整个学校工作打垮了。^③

二、解决小学教育与群众实际生活之间的矛盾

由前文可知，根据地小学教育与群众实际生活之间的矛盾主要有二：其一，上学需要一定的经济能力，而贫苦的群众却没有；其二，小学教育不能满足群众的实际需要和期待，他们不相信学校能够培养出他们真正需要的孩子。因此，根据地小学能否成功招生，关键在于能否解决这对矛盾。

解决第一个矛盾即克服经济困难，华北抗日根据地小学采取为贫抗属儿童申请公费优待、特殊时期向政府借粮、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厉行节约、提倡互助等措施。优待贫抗属儿童，给予其公费支持是解决经济问题最直接的方式。中共抗日根据地有专门的《优待条例》，各地优待标准有所差异，主要由当地经济水平及所需优待之贫抗属儿童具体情况而定。比如 1940 年晋冀鲁豫边区的优待标准为家境在合理负担免征点以下之子弟、家在敌占区或由敌占区逃往根据地且家庭无力自给之子弟。在符合这些标准的前提下，抗属具有优先权。优待办法为：初小学生按年级，须有政府发给课本，高小优待生和政府工作人员享有同等数额的粮食、菜金及书籍文具费（每月 1 元），服装则由学生自备。^④

1940 年，同为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冀南太行太岳区颁布《各级小学优待穷苦儿童及贫寒抗属子弟入学暂行条例》，规定初小不能合理负担的抗属子弟、无其他收入的雇工及工人子弟、普通户年人均收入折合小米一石五斗以下之穷苦子弟皆可享受优待；高小不能合理负担之普通户子弟、年人均全部收入折合小米三石以下之抗属子弟及敌占区内之儿童皆可享受优待。具体优待办法包括：初小学生根据年级之不同，由政府发给必要的文具和课本等，具体由各县根据实际情况规定。高小学生凡合乎优待标准者，一律供给粮食菜金、书籍文具等。^⑤1944 年晋冀鲁豫的武东县第四高级小学校优待标准为学习优等、家境贫穷、政治思想坚定，

^① 《关于黑峪口文化教育的调查材料及黑峪口知识份子调查表》（1942 年 9 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41-0001-0097-0001。

^② 《榆社县第四联合学区教育工作总结报告》（1942 年 12 月 26 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65-0001-0057-0003。

^③ 《武东县政府 1942 年 4 月初至 5 月前半月工作报告》（1942 年 6 月 1 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81-0001-0071-0004。

^④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教育厅关于颁发晋冀鲁豫边区小学贫苦学生及敌占区流亡学生优待办法的命令+优待办法》（1940 年 4 月 20 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98-0004-0007-0011。

^⑤ 《冀太联办关于各县高小放秋假一个月并在假期内切实调查学生经济状况的训令》（1940 年 9 月 16 日），档号：A197-0001-0080-0001；《冀南太行太岳区各级小学优待穷苦儿童及贫寒抗属子弟入学暂行条例》（1940 年 11 月 1 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97-0001-0076-0005。

且有区干部和村干部证明，然后由全体教职员和学生共同讨论后决定人选。^①

1942年4月1日，《边区政权》刊载的《教育工作情况》规定优待对象主要为：学习成绩和操行优秀者、流亡而无家可归或家在敌占区者、家境贫寒无力自费者、在学时间较长或年级较高者。以上四个条件中，第一个是核心标准，其他的都是参考条件，但二、三两条件及女生要重点考虑。非万不得已，宁可牺牲根据地内的贫寒生和成绩较好的男生，也要尽量优待流亡而无家可归或家在敌占区者及女生。^②

由此可见，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优待标准可能会有所不同，同一根据地的不同区县甚至不同学校的优待标准及细则也会有所差异，在符合贫抗属的原则下一切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各地根据优待条例，对符合标准之贫抗属儿童实施优待。比如：1941年，冀太联办教育处工作报告指出，各地普遍努力开展动员学生与优待贫寒儿童工作，并取得相当成绩，“冀南区小学大都能满班，而优待贫寒生太行太岳区本年5月以来，开支小米1000余石，专优待高小生”，冀南区19县统计，共优待贫寒生38786人，给以文具及半斤或一斤小米的不同优待。^③武西县第一高级小学校1941年秋季班38名学生中，公费生有24名，占全校学生63%强。^④其他各地也都按优待条例，对相关儿童进行不同程度的公费优待和救济，助力其上学。^⑤

除申请政府优待外，若遇灾荒等偶发事件，导致粮荒，学校也会向政府借粮，以缓燃眉之急。例如，1942年灾荒后，左权县第二两级小学的自费生感到粮食恐慌，1943年春季纷纷要求退学，该校为了解决学生的生活困难、稳定学生，向县政府借粮800斤。经调查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后决定，除他们本身之最低限度的供给外，学生可按日或按月伙食之比例酌借予一部分。^⑥

然而总体来看，优待名额和经费极其有限。比如，1940年晋冀鲁豫边区优待办法规定，各村初小学生优待名额最多不得超过入学儿童的五分之一，高小凡是20人以上，29人以下的班级只能有两名公费生，其中一名为流亡生、一名为贫寒生，30-39名的班次有3名公费生，其中流亡生两名、贫寒生一名，40名以上之班次，也只有4名公费生，流亡生与贫寒生各半，若无流亡生，则可均为贫寒

^① 《武东县第四高级小学校1944年2—6月工作总结报告》（1944年6月30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81-0001-0074-0004。

^② 《〈边区政权〉：教育工作情况》（1942年4月1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220-0042-0125。

^③ 《教育处工作报告》（1940年8月-1941年6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97-0001-0076-0001。

^④ 《武西县第一高级小学校工作报告》（1943年9月9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81-0001-0072-0009。

^⑤ 山西省教育史晋绥边区编写组、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史志办公室编：《晋绥革命根据地教育史资料选编（一）》（出版信息不详），1987年印，第18-19页。

^⑥ 《左权县第二两级小学校关于教育工作的报告》（1943年4月30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66-0001-0032-0001。

生。^①学校向政府借粮也只能是“救急不救穷”，而根据地的贫困是普遍且持续的，单靠政府接济是不够的，对个别儿童的优待及应急举措远远不能解决儿童们因经济原因无法上学的问题。要彻底解决此问题，还要更大程度地“开源节流”。

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是华北抗日根据地小学解决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最主要的“开源”措施，其不仅可以缓解群众经济困境，解决第一个矛盾，还能将教育与群众的实际生活密切结合，实现为群众培养孩子、培养对普通群众家庭有益的孩子的目标，满足群众送子弟上学的期待，部分解决第二个矛盾。

晋冀鲁豫的武乡县第五两级小学校为了搞好生产、减轻家长负担，1943年生产了4500余斤山药。学校师生自己动手，解决了部分吃饭问题，减轻了家长负担，学生逐渐增加。^②晋绥根据地临县一个老百姓看到学生上学后既可以读书识字，又学会了生产劳动，激动地说：“如今什么也不同了，学校里的娃娃们又会念书，又会种庄稼，长大了一定能过个好光景。”^③

1944年，晋冀鲁豫的下武学校实施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新方针后，学龄儿童入学情况大为改善。在学龄儿童总数不变的情况下，入学人数增加了237人。新教育方针大力推行劳动教育，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与家庭相结合，鼓励学生参加家务劳动，安排一定的家务劳动时间，甚至布置的家庭作业也包括家务劳动，在学校的劳动成果也会部分分配给学生及其家庭。^④这种寓教于劳的特点正好可以部分解决贫寒子弟家庭的生产生活问题，使其得以读书。^⑤

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协调家校矛盾，有的学校还会组织互助组、调整上课时间，以适应现实需要。比如辽西县就组织了放驴组、纺织组等。^⑥武家庄小学教员孙福田根据群众的劳作时间，灵活调整了上课时间。年纪小、时间充足的儿童上整日，农忙时可请假。部分因放牛等家务而缺课者，可利用早饭前或午休等空闲时间短暂到校学习。二月正值民众积肥送粪之季，儿童请假人数激增，遂统一调整课业安排，将全部下午课程前移至早饭前讲授，前半天的功课也缩短时间，便于大家忙生产，如此这般，儿童既不误上学，又能生产，老百姓非常满意。^⑦

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方式也并非十全十美，因其占用了大量的学习时间，

^①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教育厅关于颁发晋冀鲁豫边区小学贫苦学生及敌占区流亡学生优待办法的命令+优待办法》（1940年4月20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98-0004-0007-0011。

^② 《武乡县第五两级小学校1944年1至8月份工作报告》（1944年9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81-0001-0077-0008。

^③ 《晋绥边区国民教育概况》（1944年），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220-0013-0252。

^④ 个人生产成果四分之一交学校，四分之三归学生自己享受，本村学生拿回家里，外村学生由学校按时收买，将大洋用于购置书本、文具、纸张等。参考《左权县立第三高小校实施新教育方针以来的工作报告》（1944年10月1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66-0001-0039-0008。

^⑤ 《左权县1944年前半年实施新教育总结报告》（1944年10月3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66-0001-0036-0002。

^⑥ 《辽西县1944年半年来教育工作概况》（1944年9月5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66-0001-0034-0004。

^⑦ 《冀察区一专署：满城文教工作概况》（1945年6月），河北省档案馆藏，档号：0512-001-0003-0027。

尤其是让学生在学校劳动，引起了部分家长的不满。他们说：“到学堂不念书，光劳动，还不如干脆在家，还上学作甚！”针对此问题，学校采用成绩展的方式，让家长看到其子弟在学校的学习成果，从而认同该教育方针，他们看到自己的孩子既识了字，又没有耽误干活，就愿意送子弟上学了。^①比如有的家长说：“如今孩子们念了书，还不耽误生产，家里忙了告假，能告准，不像以前光会念书，不教干活，不让请假。”有的家长说：“我家孩子以前连水也不愿意担。现在变好啦。”

②

左权县第六学区初级小学在工作总结中指出，以前各村小学有的家长只想子弟入学专为读书识字，不愿其参与拾粪、积肥等学校生产，认为与其去学校劳动，不如在家里。有的贫困家庭更是直接不让子女入学，令其终日在家劳作。对此，学校积极宣传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新教育方针，各校教员也利用群众会、干部会、饭场等广泛宣传。群众体验到教育真正能与家庭、社会相结合，儿童能帮助家里打柴，驱蝗等^③，也就慢慢消除了疑虑。

教育和生产相结合的方针，一方面消除了群众对子女念书后不会生产的忧惧，另一方面又解除了儿童要参与生产而无法上学者的困境。比如木工的女儿李英兰，家里本来不让她上学，得知学校规定下午为生产时间，且生产所得全部归自己所有后，家长便送女儿入学，并带上纺车，让她上午念书、下午生产。^④

“节流”是解决经济困难的另一重要方式，“节流”就是节省开支，规定学生的食量，以减轻学生家庭的经济负担。武西县第一高级小学在谈到如何巩固学生问题时表示，学生生活要刻苦简朴、多方节约，这样就会使家长感觉学生在校开支并不比在家里多，供孩子读书并非难以承受的负担。^⑤左权县第二两级小学为了减轻学生家庭经济负担、稳住学生，曾规定学生吃饭的量，早上3两米、中午6两米（最多8两）、晚上2两米；每日吃盐菜由学校生产，炒面由家中自给（老百姓供给炒面不困难）；三日以内不下灶（婚丧疾病例外）；为了便于学生家送粮食，规定米价、杂粮豆麦等折米或以钱代购等办法。根据3月的伙食清单，每人每月实摊米20斤10两、菜4.6元，比上一年冬季每月少摊米6斤、菜14元多。并计划在春季与夏季多吃野菜，节省粮食。通过这样的努力，本季只有两个学生因生活问题而退学。^⑥

① 《左权县1944年前半年实施新教育总结报告》（1944年10月3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66-0001-0036-0002。

② 《左权县立第三高小校实施新教育方针以来的工作报告》（1944年10月1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66-0001-0039-0008。

③ 《左权县第六学区初级小学工作总结》（1944年12月30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66-0001-0039-0009。

④ 《根据地教育的改革与建设》（1945年），山东省档案馆藏，档号：G资料-03-0628。

⑤ 《武西县第一高级小学校工作报告》（1943年9月9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81-0001-0072-0009。

⑥ 《左权县第二两级小学校关于教育工作的报告》（1943年4月30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66-

解决第二个矛盾除了实施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让群众相信学校是在为自己培养孩子之外,还需要努力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员质量,让家长看到学校的培养能力,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学校决策、了解学校工作,以消除误解。

在战乱贫穷的大环境下,为了尽可能地改善办学条件,根据地小学因地制宜,采取机动灵活的措施。教员和学生必须养成战争环境下的常态教学意识,比如所有学校设备,如桌凳、书籍、挂图等教具都要注意埋藏;学校活动要加强隐蔽;处理好与群众及政权的关系,以便于在战争来临时相互帮助躲避,战后及时开学。^①若因环境恶劣不能准时上课,就利用时机、利用民房旷野分组教授,使儿童进行学业,以免危险。^②他们还通过创办“地下小学”“两面小学”等方式来躲避敌伪。^③

有的学校通过内部结构调整和重组应对战争的威胁。比如武东县将高小与初小结合,分组教学。敌人占领蟠龙镇后,各校分两组教学,将高小合并于初小之中,这样便于互相帮助,以适应战争环境,不至因小的战争与奔袭而停止教学或解散。再者,这样也可以多吸收一部分在家吃饭、在校上课的学生(也称为“通学生”),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可以节约经费。普遍在三里以内的高小学生都可以在家吃饭,如遇战争也便于分散躲避。^④

还有学校通过搬迁的方式躲避战争,以维持教学的正常开展。1942年段村敌人跃进榆社,修筑榆社公路,武西仅存的北沟几个村庄亦受到了敌人的威胁。环境的日渐恶化使学校的动员工作陷入困境、收效甚微。于是学校于4月中旬再次迁移,离开一区北沟,到达三区暖水头,在暖水头住了大约两个月,吸收了一部分三区学生,连同旧有的学生,正班生达28名,此外还有7名旁听生。在暖水头住了大约两个月后,一区的环境较前略为稳定后,学校又搬回了一区的楼则峪村属狼卧沟。这是为了迁就自费生粮食的接济,因为自费生多在一区。学校就这样解决了“缺学生”的问题,渡过了垮台危机,到1943年10月,正班生与旁听生加起来达45人。^⑤

为了解决设备短缺问题,学校就地取材、自制教具以改善教学条件,把庙宇里的神像打毁后,将庙堂用作小学校址,供桌、神椅当桌凳,利用神匾当大小黑

0001-0032-0001。

^① 《当前国民教育的改进问题——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教育处长杨希文在滨海区小学教育会议上的讨论总结》,山东省档案馆、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汇编》(第七辑),第3076页。

^② 《武西县第四联校教育工作总结报告》(1942年1月23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81-0001-0072-0002。

^③ Ellison, David Kyle (2021). "Martyrs, Models, and Miscreants: The 'Communist Child' in Wartime North China, 1937-1948,"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pp.78-79.

^④ 《武东县1943年半年来教育工作总结报告》(1943年9月12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81-0001-0074-0001。

^⑤ 《武西县第一高级小学校工作报告》(1943年9月9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81-0001-0072-0009。

板，潞城就用此办法解决了部分问题。此外，平顺各村也积极帮助学校做整顿工作，如王曲、溯头、张井等小学，在人力物力允许的情况下，或派民夫、或让大一点的学生去担白土子做粉笔、或用石灰刷墙壁，还有的用红土在墙壁上写标语、画画等，还有用石笔、石板等做教具的。^①

为了提高教员质量，各地加强教员的选拔和培训工作，规定教员的学习时间、内容，定期检查、汇报学习成果，利用假期组织集体培训。提高教员待遇和政治、社会地位，提高其工作积极性。^②1943年以后，各地陆续采取民办公助政策，让群众有机会自己筹措经费、聘请教员、参与教育教学的决策工作，既能密切群众与学校之间的关系，也能为政府节约教育经费，缓解根据地的经济压力。^③

同时，为了扭转群众对学校的偏见，破除孩子上学就是当兵、成为“公家人”等错误认知，小学教师在教育学生的同时也担负起教育周围民众的责任。他们深入了解当地人民的生活需要和风俗习惯，使自己的教育事业与当地人民的生活密切联系起来，在日常教学管理中，主张学生活泼自由的同时，也教育他们尊敬长辈、懂礼貌。比如，要学生养成清洁卫生的习惯，就要其真能自己动手打扫院落，而非自命讲卫生、到处挑剔，但从不肯拿起扫把；要教学生努力读书，同时也要提倡其闲暇之余帮助父兄做工。对于某些落后的思想和习惯（如迷信、早婚等），要明白地告诉学生以正确的道理，教会他们用道理去说服别人，而不该对于不明白的人采取谩骂的态度。这样，群众就知道了教师们并不是“只晓得蹦跳的孩子王”，而是真正为了把他们的子女“教养成人”。子女入学读书之后，不仅不会反对父母，而且还会更好地帮助其做事；使群众看见自己子女读书明理，而感到真实的喜悦。^④

三、采取差异化的动员策略

华北抗日根据地解决了小学教育与群众实际生活之间的矛盾，为儿童上学和学校招生创造了条件。但在具体实践中，如何从一家一户中把每个孩子动员到校，仍然是个不小的挑战。

首先是充分利用一切资源，将个人力量与组织力量相结合。各校都有固定的和不固定的动员学生入学的时间，固定的比如每年春秋季节开学时^⑤，开学前一月

^① 《太行第四专署关于太南各县对教育工作领导的概况》（1943年8月28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068-0003-0001-0021。

^② 《左权县第一实验小学1943年工作报告》（1944年3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66-0001-0039-0002；《晋冀鲁豫区党委宣传部关于国民教育的几点意见》（1941年7月19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001-0005-0005-0018。

^③ David, Kyle Ellison, “Martyrs, Models, and Miscreants: The ‘Communist Child’ in Wartime North China, 1937-1948,”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2021, pp.82-83.

^④ 《小学教育中的巩固学生问题》（1942年9月3日），载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抗日战争时期（下册）》（1986）。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第348页。

^⑤ 《关于黑峪口文化教育的调查材料及黑峪口知识份子调查表》（1942年9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41-0001-0097-0001。

内^①，每学期后半段的动员月，动员月主要在秋季^②，有的学校将开学第一周定为动员学生入学周^③等，在固定的动员时间内没有动员成功的，将转入持久性动员和可能机会下的动员。^④

参与动员的主体是小学教员和在读学生，但村干部、区教育助理员等干部也时常参与其中。^⑤村干部常常成为教员在村里动员儿童的重要桥梁，很多小学教员都通过村干部会议动员，教员首先与村干部取得联系，让干部起保证作用，做好群众的说服解释工作，如建立教育行政互助协会。如此，动员学生就成了他们的责任。^⑥村干部一般在村中有较强的话语权，群众愿意听从他们的劝导，所以如果他们积极参与动员学生，将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儿童团、学生会、教育委员会、青救会、妇救会等组织及团体有时也会成为动员儿童上学的重要力量。学校通过儿童团的活动把在学儿童与失学儿童从生活上连接起来，让在学儿童以伙伴的身份发挥引领作用，达到动员失学儿童上学之目的。发动在学儿童帮助家境困难的失学儿童打柴、挑水，指导其在校外学习，帮助他们逐步过渡到入学。^⑦因为作为家长的母亲在儿童上学问题上具有一定的话语权，所以妇救会在招生动员中也起着重要作用，通过妇救会给妇女们讲道理，让她们保证自己的孩子上学。^⑧同时，也可利用妇救会动员女生的母亲，促其送女儿上学。^⑨一般男人轻视女儿，不让她上学，必须动员她的母亲，利用她自己的情况来刺激她，比如说就是因为小时候父母没有送她上学，所以现在才如此受苦，并说明闺女应当娘做主，这样会使她想起自己的苦处而让女儿上学。^⑩

除广泛吸纳各类组织、个人和社会力量参与儿童上学动员外，根据地还进一步采取差异化的动员策略。

因为人的性格有所差异，家庭情况也各不相同，故而差异化的动员策略十分必要。比如山东临清在动员学生时，对地主富农说，孩子上学可学记账、打算盘，其家庭富有，也无需小孩干活，理所应当送学念书。对中农讲，其做小生意，赚

① 《晋冀鲁豫边区强迫儿童入学暂行办法》（1942年1月12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98-0004-0007-0008。

② 《关于依据小学规程建设小学的决议及小学教师学习问题的决定》（1941年3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97-0001-0082-0010。

③ 《榆北县第一两级小学校1944年2月份工作总结报告》（1944年2月29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65-0001-0057-0011。

④ 《〈边区政权〉：教育工作情况》（1942年4月1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220-0042-0125。

⑤ 《漳北办事处指示：关于克服与纠正目前小学教育严重现象》（1941年8月21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号：0571-001-0002-0022。

⑥ 《儿童生活指导》（1943年11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066-0004-0006-0011。

⑦ 《联办教育处长杜润生在冀南太行太岳教育扩大会议上的报告：全区教育工作的总结及今后教育建设的新方向》（1940年8月25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97-0001-0076-0002。

⑧ 《儿童生活指导》（1943年11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066-0004-0006-0011。

⑨ 《怎样办小学》（1945年10月），山东省档案馆藏，档号：G031-01-1824-002。

⑩ 《左权县第一实验小学1943年工作报告》（1944年3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66-0001-0039-0002。

欠还得求人，如果孩子上学，学会记账、打算盘，往后就不用求人了。告诉贫农，如果不是八路军、共产党，贫苦孩子则无读书之机会，学校还组织生产劳动组，助其拾柴，特殊情况者可实行半日制、隔日制。对赤贫讲，学校会开展相关运动，村干、劳模、积极分子会为其募捐补助，孩子的吃饭问题和念书问题能同时解决。^①

动员一般家庭的孩子则主要采用常规的说服动员法，通过召开村干部会议、群众大会、拉拢校外儿童领袖、教员和学生亲自上门说服等方式。比如，晋察冀根据地的平北县在动员学生时，首先召开村干部会议，利用干部动员。教员利用各种集会、各个时机进行宣传鼓动，家庭访问、多次说服、召开恳亲会，让其家长明白学校情形和学生成绩；利用儿童干部分组比赛，看谁动员的多。教员深入了解儿童不上学的原因，并为其解决困难。^②若为其解决困难后，还不能动员成功的话，就要坚持反复动员。^③

晋冀鲁豫的左权县第一实验小学通过村政权调查学龄儿童，并研究其家庭状况，失学半日者，隔日再让村政权做一般动员。通过儿童团组织动员，并由已入学之儿童竞赛动员，但这方法仅能动员一部分小儿童和极少数愿意上学的学生。教员分头挨门挨户地动员，此方法效果好且动员的学生易巩固，给各村长去信，让其动员，但收效甚微。^④榆北县第一两级小学校总结其动员儿童上学的办法为：将开学第一周定为动员学生入学周，在开学的当天下午召开全校儿童干部会议，布置调查学龄儿童及动员入学工作。儿童干部动员是按班组织分工，挨门挨户逐个动员。通过这次的动员，到校 80 余人，后又召开了村干部会议，逐户讨论了各儿童的家庭情形，结果是凡在 7-13 岁的儿童一律入学，13 岁以上 15 岁以下的儿童，因家庭困难无法入学的，转入民众学校，其每日必须到校。此外，还向家长说明上学的重要性和不识字的害处，及政府对无故失学儿童家长的惩处办法。这时又配合着儿童干部二次动员，并且召集个别典型家长详细说服后，学生才慢慢入学。^⑤

山东临清在动员此类儿童时，首先召开村干部会议，了解村中各阶层学龄儿童的概况，鼓励村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让其率先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学校念书。然后在召开群众会上给他们具体分工，某某动员哪几条胡同、哪几条街、哪几家，让他们挨家逐户去动员，如果有大众黑板报，及时表扬他们，得到表扬后，他们

^① 《怎样办小学》（1945 年 10 月），山东省档案馆藏，档号：G031-01-1824-002。

^② 《平北县一年来教育工作总结》（1941 年 9 月 20 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91-0001-0042-0003。

^③ 山西省教育史晋绥边区编写组、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史志办公室编（1987）：《晋绥革命根据地教育史资料选编（一）》。出版地不详，第 37 页。

^④ 《左权县第一实验小学 1943 年工作报告》（1944 年 3 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66-0001-0039-0002。

^⑤ 《榆北县第一两级小学校 1944 年 2 月份工作总结报告》（1944 年 2 月 29 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65-0001-0057-0011。

会更为主动。^①

动员贫苦家庭的孩子,最重要的是帮助其解决实际困难。对贫苦无力的家长,光说念书有好处是不起作用的,必须态度诚恳,对他的处境表示同情和理解,告诉他自己多吃些苦,送孩子读书,以免孩子再重复自己的路,以这样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方式使他鼓起勇气,然后再帮他解决现实困境,比如动员一个开饭铺的贫苦儿童时,准许他在赶集那天请假。^②动员讨饭的儿童时,为其规划,让他五天时间中,两天赶集讨饭,剩余三天上学。^③

临清县还通过帮助儿童做生意,让村干部协助其家庭解决困难等方式解决贫苦儿童的吃饭问题。十二区下堡寺小学生,集体开办合作社,极贫学生共26人,出劳力算股份,每天抬着棉、油、纸烟、食盐等日用品到各商铺及家户卖,参与分红即可解决半天的生活,再加上每10天有4个集市,他们在牲口市上拾粪所卖之钱,不但够吃喝,而且还能剩余一部分,所以他们从不无故旷课。十区党尔岩的教育委员学占奎、劳模学保堂给孤儿张保瑞募集了400元贩卖烟卷的本钱,让他利用课余时间卖烟卷,所得红利也解决了生活困难,从而可以上学。^④武乡县第五两级小学校1944在工作总结报告中说,由于拜访了家长,为学生解决了困难,才巩固了学生,扩大了学校。可见帮助学生解决困难在成功动员学生上学中具有重要意义。^⑤

动员落后家庭的孩子,除采取说服动员法外,必要时还辅之以强制措施。这类家长,一般的说服动员是无效的,须动员其亲信说服,并辅之以其他手段。比如,临清十区党尔岩的李秀英,和母亲相依为命,她的母亲思想落后,不让她念书。针对这种情况,首先是在校学生去动员,每天放学后,学生就去教她唱歌、打花棍,其很是开心和羡慕,但后来母亲发觉学生去她家是为了动员她上学后,就把学生骂跑了。然后村干部及教育委员会又去动员两次,亦无果。再后,学生又偷偷地动员她去学校跳舞,她告诉母亲说自己去串门儿,实际是偷跑到学校,此时的李秀英已经非常渴望上学。教员打听到她母亲和当街的李路红之妻关系好,托其前往劝说两次后,她才勉强允许女儿每天念一晌,三天过后过渡到整日制。李秀英到校后非常努力,她又动员了16个女生入学,还被选为姐妹团长和模范学生。^⑥

抓典型、“啃硬骨头”也是动员这类家长的常用手段,先动员最顽固的,如

^① 《怎样办小学》(1945年10月),山东省档案馆藏,档号:G031-01-1824-002。

^② 《左权县第一实验小学1943年工作报告》(1944年3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66-0001-0039-0002。

^③ 《怎样办小学》(1945年10月),山东省档案馆藏,档号:G031-01-1824-002。

^④ 《怎样办小学》(1945年10月),山东省档案馆藏,档号:G031-01-1824-002。

^⑤ 《武乡县第五两级小学校1944年1至8月份工作报告》(1944年9月),山东省档案馆藏,档号:A181-0001-0077-0008。

^⑥ 《怎样办小学》(1945年10月),山东省档案馆藏,档号:G031-01-1824-002。

果把这“硬骨头”啃下了，其他人就会审时度势，想着：“还是去吧！人家谁谁还去哩！”^①倘若这些方法还不管用，则辅之以强迫动员法。比如 1942 年《晋冀鲁豫边区强迫儿童入学暂行办法》规定：小学前四年为义务教育，根据边区小学规程第三条之规定，凡 6-15 周岁之儿童，除因特殊情况经当地教育机关特许外，应强迫入学。乡村学龄儿童应于开学前一月内由乡村小学教师协同教育委员会详细调查登记，在调查中并进行深入动员，说明儿童应当入学之理由与利益，以资说服。儿童家长经劝说无效后应该：第一次由村长予以劝告，村长劝告无效时即送区或交督学，由区长或督学予以劝告，区长或督学劝告无效时，则应处以 3-5 元之罚金，处罚权由区长或督学行使，执行此处罚还无效时，应加重处罚，罚金用以学校奖金或购置设备。^②

由于强迫动员方式具有简单且见效快的特点，各地都有不同程度的运用。平山县曾在其经验总结中说，强迫是有效的，由于农民眼光狭隘，总想逃避入学，但又害怕公家处分，所以强迫办法一实行就效果显著。^③但从长远来看，其弊端也是明显的，比如被强迫上学者，因情非所愿而不易巩固，更容易中途退学，造成二次动员的麻烦。此外，强迫的方式也不利于团结群众。冀太联办教育处长杜润生就曾多次强调，制度（结果）是强迫的，动员方式应是说服，一味的强迫会引起人民的误会。^④鉴于此，各地在使用强迫方式的同时也强调以说服为主，强迫只能是不得已之下的暂时辅助手段。比如 1941 年冀太联办指示各县可指定一二村庄试行强迫入学，但仍以政治说服为重。^⑤1942 年神府县政府第三科也强调动员要以说服为主，强迫命令为辅。^⑥总之，通过说服的方式成功动员儿童上学是各校追求的目标。

那么，在客观条件^⑦不变的情况下，如何才能实现高效的说服呢？由于需要被说服的对象主要是家长，所以建立良好的群众关系是实现成功说服的关键。教员该如何建立良好的群众关系，1943 年 11 月的《儿童生活指导》建议：第一，尊重村干部并协助其开展工作。教员到村首先接触的就是村干部，他们对教员的印象直接影响群众对教员的评价，所以教员要尊重他们的工作经验，与其团结协

^① 《左权县第一实验小学 1943 年工作报告》（1944 年 3 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66-0001-0039-0002。

^② 《晋冀鲁豫边区强迫儿童入学暂行办法》（1942 年 1 月 12 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98-0004-0007-0008。

^③ 《平山教育工作前半年总结（一月—七月）》（1943 年 9 月 15 日），载王谦主编：《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初等教育分册（上）》（1990）。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第 116 页。

^④ 《联办教育处长杜润生在冀南太行太岳教育扩大会议上的报告：全区教育工作的总结及今后教育建设的新方向》（1940 年 8 月 25 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97-0001-0076-0002。

^⑤ 《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关于整顿小学的指示信》（1941 年 6 月 16 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97-0001-0001-0081-0010。

^⑥ 《神府县政府第三科 1942 年上半年教育工作报告》（1942 年 8 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098-0002-0007-0003。

^⑦ 诸如经济条件等前文已经分析过的那些影响儿童上学的因素。

作、遇事共商解决；第二，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群众对教员的印象很多来源于其子弟之转述，所以教员需关怀学生日常，耐心纠错、公正调处矛盾，赢得学生信服；第三，尊重儿童家长并认真教学，以诚恳的态度主动与其沟通，帮扶群众生活困难、提供可行建议，认真教学，并在家长会、大众黑板报上表扬成绩优异的学生，让家长看到其子弟学有所获，从而乐意让其上学，减少学生中途退学的现象。^①

综上所述，华北抗日根据地小学动员学生上学的方法主要有说服和强迫两种，说服的形式大致可细分为两种，一是通过个人说服，比如教员、在读学生及村干部等动员者直接与家长对话，设法说服他们送子弟上学；二是通过集体来说服，比如通过村干部会议，群众大会，家长会、妇救会、青救会、儿童团等组织和团体来说服。具体采用哪种方式，则依据动员对象的实际情况而定。

结语

总体而言，导致根据地儿童上学难、学校招生难的关键在于小学教育与群众实际生活之间的矛盾，即上学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和广大群众之贫穷落后之间的矛盾；学校在战争紧张、物质匮乏的环境下，如何创造办学条件、调整办学方向，拉近学校与群众的关系，让他们看到小学是在为他们自己培养孩子，能够培养出他们真正需要的孩子，从而乐意送子弟上学。

在解决儿童上学难、学校招生难的过程中，根据地教员、学生、基层政权干部等个人和儿童团、青救会、妇救会等组织以及普通群众之间，根据具体情况协同互助，采取机动灵活的应对策略解决矛盾，为儿童上学和学校成功招生创造条件，并真正地实现从一家一户中把孩子成功动员到校，为贫苦群众赢得上学机会的同时，也为中共抗战、根据地政权建设乃至此后的国家发展培养了人才。

动员上学是中共战时群众工作方法与基层治理策略在教育领域的具体实践，其成功经验为新中国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历史借鉴^②，也为今天的乡村建设与基层治理提供了思想启迪。

作者简介

郑芳，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史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抗日战争史、根据地史、乡村教育史。

^① 《儿童生活指导》（1943年11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066-0004-0006-0011。

^② 儿童上学难、学校招生难是长期制约乡村特别是偏远落后地区教育发展的一大顽疾。直到本世纪初，国家“两免一补”政策落地实施，这一问题才基本得以解决。文中所述相关策略在新中国乡村教育发展中依然沿用，比如鼓励民众参与办学、实施勤工俭学制度和放忙假制度，以及由村干部、重要亲友及在校生等共同参与动员失学儿童上学等。